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13位ISBN编号：9787560826219

10位ISBN编号：7560826210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同济大学出版社

作者：维特根斯坦

页数：223

译者：徐为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gt;&gt;

## 前言

本书中的这些译文资料基本上都来源于已故的费里德里希·魏斯曼（1897—1959）的文稿。只有在原魏斯曼的文稿《提纲》中遗失（附录B）的少数几页由耶路撒冷的约瑟夫·谢切尔博士提供，而关于数学哲学笔记（附录A）的某些部分现仅以摘要的形式存在了，它们是由现居特拉维夫的谢姆逊·斯泰因先生摘录的。

所有这些资料最初是由本出版社和法兰克福的苏康出版社于1967年用德文原文联合出版的。

本书在页码上尽可能地与最早的版本保持一致。

所有文稿都系魏斯曼先生本人撰写。

维特根斯坦当时虽心存疑虑，却也乐意看到他的思想通过魏斯曼的记录整理至少在维也纳得到传播。然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对这种方式渐渐地感到不满意，转而寻求与魏斯曼的完全合作。

当这种方式也被证明不令人满意时，他又通过与石里克的几次谈话和“蓝皮书”的复本以及其他口述笔记，将他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传达给维也纳学派同行。

魏斯曼本人则把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哲学的许多观念糅合进他的《数学思想导论》一书中，该书首见于1936年，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魏斯曼的作品。

而他的《逻辑、语言和哲学》一书虽曾在1929—1931年间被多次谈及，但却未能在魏斯曼的有生之年出版；该书多次修改，这或许就是它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吧。

最后，该书在魏斯曼逝世6年后被翻译出版，取名为《语言哲学原理》，与原来的观点相比已大有改动。

本书主要部分内容最早出版的材料中包括了1929年12月的一次对话记录。

那一年，维特根斯坦是在剑桥度过的：他重新回到哲学事业上来，并把它作为一项主要事业，可追溯到那时。

但是，可以想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已开始对哲学恢复兴趣，这或许是被旁人所激发，亦或许是出于本心。

拉姆齐在1923年以及1924年数次拜访维特根斯坦，其中1924年那次历时六七个月。

两人探讨了《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英文翻译中的若干改动，这些改动实际上已为第二版所采纳。

他们还讨论了数学基础问题以及在《数学原理》第二版中将作的某些变动。

然而，在1924年3月24日，拉姆齐给凯恩斯写了一封信，谈到维特根斯坦显然感到运思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而需要像拉姆齐那样的人给予他激励。

维特根斯坦随后（1924年7月4日）写信给凯恩斯说：“你在信中间是否有可能帮我回到科学研究上来有所作为。

我的回答是，不，在这一方面我已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对此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内在动力。

我真正要说的已经说了，而且我已才思枯竭。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

”但这只是暂时的。

维特根斯坦本打算在剑桥度过获得博士学位，最终也放弃了，而在1925年他对英国所作的访问，也仅仅成了对朋友们的拜访。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逻辑哲学论》成了热门话题。

数学家哈恩在1922年就这一著作开办了一个专题研讨班，两位教授，即哲学家石里克和数学家科特·雷德曼斯特当时刚来到维也纳，他们被该书深深触动。

于是，石里克给维特根斯坦写了一封信（1924年12月25日）。

作为您的《逻辑哲学论》的仰慕者，我早就想与您联系了。

但是，由于我的授课工作和其他的一些串务，这一想法一直未付诸行动，转眼，我到维也纳已将近5个学期过去了。

每个冬季学期，我与我的同事和一些对逻辑和数学基础感兴趣的极有天赋的学生都定期聚会，我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们常常提到你的大名，尤其是自从我的数学同事雷德曼斯特教授在一次讲座上就你的著作作了报告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对此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因此，这里有许多人——包括我——深信您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并且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做点什么以使您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石里克接着询问了怎样才能得到《逻辑哲学论》一书）……对我来说，如能与你会面将会令我倍感荣幸，我很乐意有机会到普赫贝格拜访您。除非您不希望有人打搅你的乡居生活。

.....

##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20世纪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弗里希·魏斯曼的笔记编辑而成，生动记录了1929年至1932年期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谈话，内容涉及哲学、逻辑、数学诸领域，由魏斯曼所辑的“附录”提纲挈领，对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万有助益。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作者简介

徐为民，1966年生，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分析哲学和逻辑哲学研究。  
现为浙江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孙善春，1973年生，哲学硕士，主要从事德国哲学、美学研究，现为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讲师。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书籍目录

总序维特根斯坦著作索引英文版编译者序言第一部分 一、1929年12月18日，星期三（在石里克家） 1  
数学证明 2 在数学中寻找某物意味着什么？  
3 作为句法的几何学I 4 一致性I 二、1929年12月22日，星期日（在石里克家） 1 “所有”I 2 唯我论  
3 语言与世界 三、1929年12月25日，星期三（在石里克家） 1 “所有”II 2 时间 3 视觉空间 4 作为句  
法的几何学II 5 物理学和现象学 6 颜色系统 7 反胡塞尔 四、1929年12月30日，星期一（在石里克家）  
1 关于海德格尔 2 狄德金的定义 3 实数I 五、1930年1月2日，星期四 1 原初命题 2 “数学知识的现状”  
六、1930年1月5日，星期日（在石里克家） 1 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 2 记忆中的蓝色 3 “世界的红色的  
”II 4 每个命题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吗？  
II 5 推理 6 关于伦理学的演讲 7 概率I 8 骰子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第七部分附  
录B后记

## &lt;&lt;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gt;&gt;

## 章节摘录

六. 1930年1月5日, 星期日 ‘在石里克家, 1 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 (I) 否定命题比肯定命题少些意义吗?

是, 但又不是。

是, 如果所指的是下面的情形: 如果我能从 $p$ 推出 $Q$ , 而不是从 $q$ 推出 $p$ , 那么,  $q$ 比 $p$ 少些意义。于是, 如果我说: “这朵杜鹃花是红色的”和“这朵杜鹃花不是蓝色的”, 那么, 我能从前一个命题推出后一个命题, 而不是相反。

在这一意义上, 你可以说否定命题比肯定命题少些意义。

不是, 如果所指的是下面的情形 (这是我的主要看法): 否定命题和肯定命题一样赋予了实在同样多的多样性。

如果我说, “我没有胃痛”, 那么, 与我说“我有胃痛”时一样, 赋予了实在同样多的多样性。

因为, 如果我说“我有胃痛”, 那么, 仅仅通过这一命题, 我预设了一个肯定命题的存在, 我预设了胃痛的可能性, 而且, 我的命题在胃痛空间中确立了一个位置。

并不是好像我目前的状况与胃痛没有一点关系 [如果我说: “今天摄氏零度”, 那么, 据此我已经描绘了温度空间中的零位特征]。

如果我说: “我没有胃痛”, 那么, 可以说, 我“我处在胃痛空间中的零位”。

但是, 我的命题预设了整个逻辑空间。

[同样, “那两个物体之间不存在距离”与命题“那两个物体之间相互保持着某某距离”是同一种类的命题, 这两种情形有着同样的多样性]。

当我说肯定命题并不比否定命题多一些意义时, 我指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关于实在, 两者都赋予了实在同样的多样性。

魏斯曼: 与肯定命题相比, 否定命题给予实在更多的余地. 例如, 如果我说, “这朵杜鹃花不是蓝色的”, 那么, 我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维特根斯坦: 当然。

在这一意义上, 否定命题比肯定命题少说了一些东西. 我曾经写道: “如果我知道一个命题为真和为假的情形, 那么, 我也知道了这个命题的意义。

” ”’ 据此, 我认为, 如果我知道什么时候它是真的, 那么, 同样地, 我也知道什么时候它是假的。

如果我说“这朵杜鹃花不蓝色的”, 那么, 我也知道了它什么时候是蓝色的。

为了认知它不是蓝色的, 我必须把它与实在进行比较。

魏斯曼: 你使用了“比较”这个词。

但是, 当我把一个命题与实在进行比较时, 我知道这朵杜鹃花是红色的, 并据此我推出它不是蓝色的, 不是绿色的, 不是黄色的。

我见到的只不过是事态而已。

但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朵杜鹃花不是蓝色的。

维特根斯坦: 我并没有看见红色: 相反, 我看见那朵杜鹃花是红色的。

在这一意义上, 我也看见它不是蓝色的。

结论并不来源于我所见到的东西: 不——结论是作为看的一部分而直接得知的。

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处于同一层面。

当我用一把标尺来测量某物时, 我不仅知道某物有多少长, 而且也知道它没有多少长。

为了证实一个肯定命题, 我也要证伪它的否定命题。

无论何时, 当我知道这朵杜鹃花是红色的, 那么我也知道它不是蓝色的。

这两种情形是不可分的。

命题的真值一条件预设了它的假值一条件, 并且, 反之亦然。

2. 记忆中的蓝色 我们的记忆的本性是非常奇怪的。

通常认为, 我们具有某种关于我们身边的颜色的记忆一图像, 而且, 把这一记忆图像与我此时所见的某种颜色进行比较。

## &lt;&lt;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gt;&gt;

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的问题。

实际情形并不是那样。

想象一下如下情形，你看到了一种特定的蓝色——如天蓝色——而且，接着，我给你看不同的蓝色样本。

于是你说：“不，不，不是这种，不是那种，不是种——好，就是这种！”

好像你的头脑中有种种各样的按钮，而我试着去按它们，直到我按到了一个特定的按钮，接着，那个铃响了，是吗？

识别一种颜色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吗？

当我恰看见这种颜色时，在我身上的铃响了，好像有某种卡嗒声响吗？

不！

确切地说，我不仅知道某种特定的蓝色不是那种真正的蓝色，而且，我也知道我必须在什么方位改变这种颜色以便到达那种真正的颜色。

[1]这意味着，我知道寻求这种颜色的方法。

如果你不得不混合那种颜色，那么，通过说“更白一点，再白一点，不，太白了，蓝一点，等等”，我能给你提供一些线索。

这就是说，这种颜色预设了整个颜色系统。

认知一种颜色不仅仅也是比较的问题，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与比较有些相似，认知活动看起来像比较，但去认知并不是去比较。

[2] 顺便提一下，在一个客厅一游戏中，你寻找一枚藏起来的别针，实际上你不是正在空间中寻找它——因为无论怎么样，你都没有寻找它的方法——而是在逻辑空间中，这个空间是我通过“冷”、“暖”、“热”这些词创立的。

只有当存在着一种找寻某物的方法时，你才能找到它。

3. “世界是红色的” [3] 我再回到石里克教授的问题上来。

如果我只知道红色这样一种颜色，那将会怎样？

关这个问题，我应当指出，如果我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红色的，而且，我能够描述它，那么，我必定也能够构建一个命题，它不是红色的。

这里预设了其他颜色的可能性。

否则，红色就是某种我不能描述的东西——于是，我也不会拥有命题，而且，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否定的东西。

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所有的东西都是红色的”，或者“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红色的”这样的陈述了。

一句话，在这里，可以说，红色所起的作用，与时间在我们的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因此，如果存在着一个事态，那么它就能够被描述，而且，红色预设了一个颜色系统。

否则，红色就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因而，再称它为红色就没有意义。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甚至不可能去谈论它。

4. 每个命题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吗？

首先，这依赖于你所说的“系统”是什么意思。

关于长度的一个说明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知道某个东西是3米长，那么我也知道，说它是5米长是什么意思。

这个说明属于长度的可能空间。

同样，这个东西被颜色空间、硬度空间等等所包围。

当我写下这些时，可以说，我似乎仍然不清楚在这个空间中形成标尺上的刻度标志的位置的数目，而且，仍然没有明白我们总是像标尺那样，用整个命题系统面对实在。

这一普遍的问题应该用这样的形式提出来：“a”预设了同类命题中的其他命题，如“b”了吗？

.....



##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 编辑推荐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

其时为十六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

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

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

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文和法文，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

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

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

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学刊》（年刊）。

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